

美军披露新装备研发进展

■刘柯涵

据美国媒体报道，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频繁向外界披露新型武器研发和在研项目进展，并宣称是“为应对未来高端战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亮出军事领域所谓尖端技术“底牌”，意在展现一体化威慑战略下的军备姿态。

首曝“变种人”空空导弹

在新披露的项目中，反高超音速导弹、反无人/反智能武器等尖端技术受到不少关注。其中，五角大楼首次公开了“可动式鼻锥导弹性能改变”计划，又被称为“变种人”空空导弹项目。该项目已秘密进行超过6年，不久前完成了首次地面测试并取得成功。

美军表示，“变种人”空空导弹是基于现役“地狱火”空空对地导弹进行颠覆性技术改造而来。与常规设计的空空导弹不同，“变种人”空空导弹引入“可变弯曲柔性弹体”这一新概念，在弹头与弹体之间加装了一个特殊的旋转段，从而使弹头可以实现大角度转向。同时，大幅减少弹体上的边条翼，显著提高了导弹的飞行速度、射程和隐身性。“变种人”空空导弹还首次在核心部件中使用了可承受900℃高温的新型金属材料。

据介绍，“变种人”空空导弹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直到近些年才进入研发和测试阶段。根据计划，2023年至2024年底，美空军还将进行至少4次测试，包括空中发射试验。外媒分析认为，“变种人”空空导弹集成了弹头可变形和攻防两用等优势，是美军新一代导弹系统的雏形。它可在短时间内不断修正飞行轨迹，完成对锁定目标的攻击，包括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等。在搭载平台方面，美军现役AH-64



美军士兵将“地狱火”空空对地导弹装载在AH-64“阿帕奇”直升机上。

“阿帕奇”、MH-60“海鹰”、AH-1Z“眼镜蛇”等主力直升机和AC-130炮艇机均可挂载“地狱火”空空对地导弹，预计将成为“变种人”空空导弹的首批试用者。未来，美国还计划在MQ-9和MQ-1B无人机上使用“变种人”空空导弹，并将项目成果运用到F-35战斗机的配套武器中。

推动反无人系统建设

与“变种人”同期亮相的项目，还有美国国防部推出的反无人系统专项研究。与前者不同的是，该项目更注重能力整合，即在现有反无人作战能力基础上，强调“软杀伤”与“硬摧毁”的结合，五角大楼将其称为“反多域无人系统”。

该项目在技术理念方面并无太多创新，主要是系统整合了美军现有反无人技术的资源，重点聚焦3个领域，以吸引军工企业加入。首先是研发新一代传感

器，具体包括先进的装备系统、尖端技术和优化算法，以识别单个隐身或高速无人目标，由潜艇发射的无人机或无人潜航器等。其次是提升对无人机自主控制系统的压制能力，涵盖导航定位干扰、数据链通信压制和针对无人系统的网络渗透破坏。再次是被动防御能力建设，例如改变地形地貌以“误导”无人系统、向电子图像数据中“注入”虚假信息使其无法识别瞄准等。

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推动“反多域无人系统”的建设，将成为美军军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标志着美军正整合关键技术以形成一体化作战优势，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无人化战场和智能化武器威胁。

释放军备科技“烟幕弹”

除加速推进上述项目外，美国近日还将量子技术、安全且有冗余的通信技

术、生物工程、天基技术、高性能电池、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列为“赢取未来战争”的7项关键技术，同时将前4项定义为“冲刺技术”，后3项定义为“跟随技术”。美方宣称，将加大对相关技术的投资，实现军备的跨越式提升。

针对美国频繁向外界展示新型武器研发和在研项目进展的做法，外媒评论认为，“变种人”项目是一项高耗资的工程，最快在2026年才能初见成效，最早也要到2030年才能装备部队，“美军部分战斗机可能在退役前都无法搭载该导弹”，而美政府更迭后的政策理念也可能导致该项目中断或“下马”；至于反无人系统专项研究，看似是一种新的技术趋势，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

还有媒体评论称，美军炒作多个项目概念，实际上是在制造军备科技领域的“迷雾”，诱导潜在对手过分关注所谓尖端、前沿的军备技术，忽视常规军力建设，陷入军备竞赛的误区。

日本展开“全球南方”外交攻势

■文成入

5月19日至21日，七国集团(G7)峰会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在峰会前夕，针对日本政府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13日和14日，日本民众在广岛集会和游行，谴责G7广岛峰会打着“自由民主”旗号，行“军事同盟”之实。

作为G7轮值主席国，日本今年邀请了被其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加峰会扩大会议，包括印尼、科摩罗、巴西等国，会议将重点探讨并提出加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具体措施。这被视为日本近期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攻势的又一举动，反映了自去年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向重点。

急于拉拢“新势力”

“全球南方”一词并未有权威的官方定义，一般泛指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通常保持中立，避免在国际争端中直接支持任何一方，其国际立场带有明显的非西方视角，主张不干预他国内政，同时着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全球南方”通常包括东南亚、非洲、南美和中美洲等地区国家。从2022年2月开始，“全球南方”话题在日本逐渐升温，并逐步上升为主流外交政策话语。今年以来，日本利用担任G7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不断加强“全球南方”外交攻势。

1月4日至11日，日本外相林芳正

访问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月29日至5月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后前往埃及、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4国，开启日本首相时隔7年的访非之旅。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调整其外交定位，对“全球南方”投入大量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不断演变，“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决策上，这些国家展示出独立自主的非官立场，其道义感召力、理念塑造力、规则制定力、议程设置力、变革推动力不断提升，成为国际上不容忽的“新势力”，使得日本认识到与其深化合作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希望，在深化与“全球南方”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既确保日本自身外交优势，又要树立政治大国形象。

持续挑动阵营对抗

日本对“全球南方”投入大量关注，可以概括为“一拉两拓”策略。

“一拉”指的是对新兴国家进行分化拉拢，加剧阵营对抗。近年来，日本积极跟美国一起塑造冷战式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日本主动表态“愿成为G7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为平台，意图对新兴国家群体进行“再分类”，将其中一些国家拉入西方阵营，不断扩大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和规模。

在访问非洲期间，岸田文雄多次宣扬恢复“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希望非洲国家就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进行亲西方立场的表态。在今年1月访美期间，岸田文雄表示：“如果对新兴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全球南方’视而不见，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少数派。”由此可见，日本已将“全球南方”外交作为其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新的竞技场。

“两拓”指的是日本拓展“政治大国”影响力寻找平台，为日本与“全球南方”在多领域合作拓展机会。近年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秩序枷锁”，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一直执着于推动安理会改革，争取“入常”，而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无疑是联合国“大票仓”，对日本推动国际议题、展示自身影响力有着巨大作用。同时，日本希望加强与新兴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向“全球南方”展示其“印太构想”，彰显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同时对美国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做出呼应。

分析人士指出，“全球南方”大多是二战后从殖民统治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他们对像日本这样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抱有天然警惕和怀疑。他们对互不干涉、非结盟已形成共识，不愿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棋子。更重要的是，这些已经饱受殖民之痛、发展之痛的国家，不应再成为国际竞争的角力场，不应被视为推动大国竞争和地缘博弈的工具。

环球时评

当地时间5月13日晚，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高级官员证实，在埃及斡旋下，杰哈德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已经达成，并于当天22时生效。

此次冲突由以色列对杰哈德的袭击引发。5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动“盾牌行动”，空袭加沙地带多处杰哈德军事目标，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杰哈德高级成员。作为回应，杰哈德从10日午后开始向以色列南部和中东部地区发射大量火箭弹。以军则持续对杰哈德军事目标发动空袭。

这是巴以双方本月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冲突。5月2日凌晨，在以色列监狱中绝食抗议的杰哈德高级成员阿德南身亡。以南部当天下午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以军在夜间出动战斗机对加沙地带多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在埃及、卡塔尔和联合国斡旋下，双方于3日达成停火协议。

5月发生的两次巴以冲突，从微观角度看，是今年初以来巴以冲突的延续。自2022年底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极右翼六党联盟新政府上台以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为尊贵圣地)和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的行动更加激进。今年1月，以色列首任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位于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广场，此后巴以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接连不断。4月5日，以色列警方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与寺内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巴以冲突再次升级。而杰哈德高级成员阿德南的死亡，进一步激化了巴以关系。

从宏观角度看，这两次冲突是巴以关系持续恶化的最新展现。随着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启曾令国际社会看到巴以和平的曙光。然而，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给探索中的巴以和解之路蒙上了阴影。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广场事件，更是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此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同时，巴勒斯坦也陷入分裂状态，即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加剧，并逐步形成以

色列、法塔赫、哈马斯“两国三边”的对抗模式。巴以冲突日益表现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以色列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带。近年来，以色列与杰哈德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有所升级。以色列试图区别对待杰哈德与哈马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杰哈德与哈马斯联手抗以的局面。

自今年3月以来，中东地区迎来“和解潮”，这对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战略压力。3月19日，埃及主持召开由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美国和埃及5国人员参加的沙姆沙伊赫五方会谈，旨在缓和巴以局势。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色列极右翼政府上台后，执政联盟成员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圣地和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不断越过“红线”；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势力分化明显，无法在反以色列上形成合力，各派以对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未来一段时期内，巴以关系实现根本性和解希望渺茫。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韩国加快推进国防改革

■陈岳 杨倩

5月11日，韩国正式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防创新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加快推进国防与军队改革和筹备成立战略司令部。此举旨在全面提升韩军作战能力，深化韩国军事战略和作战运用的外向性与进攻性。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创新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审议和调整《国防革新4.0基本计划》。该计划指出，韩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韩军必须充分利用机器人、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第四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推动建设“AI科技强军”。此次召开的国防创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要目标是为国防改革提供制度化保障，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国防改革重点和发展方向。按照计划，韩国将构建以有人/无人系统为中心的精简型军队结构，同时提升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作战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宽镇被任命为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曾多次在半岛局势紧张时，表达“先行后报告”“先制打击”的强硬立场。金宽镇在本次会议上表示：“韩国绝不能错过将尖端技术纳入军事行动概念的机会，我们将创造一支规模更小但更强大的军队，在半岛发生冲突时彻底击败对手。”

报道称，韩国筹备成立战略司令部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军就曾设想成立战略司令部，但后来计划一直搁置。尹锡悦政府上台后，2022年7月，韩国国防部宣布设立统筹指挥“韩国型三轴体系”的

战略司令部。韩国新版《国防白皮书》规定，战略司令部将整合和提升韩军的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太空、网络和电磁频谱等多领域能力，并主导相关力量的系统性战略发展，具体推进步骤分为3个阶段。首先，将联合参谋本部的“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中心”扩展为“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本部”；其次，“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本部”使用战略司令部临时编制进行试运行；最后，针对试运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完善，通过制订作战计划，构建指挥控制体系、评估和验证运用能力，正式成立战略司令部。尹锡悦表示，“韩军需要具备侦察监视、情报分析、精确打击和多层防空能力，韩军战略司令部将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近期，韩国加速扩军步伐，其军事战略的外向性与进攻性日益凸显。韩国密集发布了《国防白皮书》《国防革新4.0基本计划》《2023至2037年国防科学技术革新基本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并加速武器装备的研发、部署和采购。此外，韩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加速向右转。韩美同盟已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韩国正积极推动美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等在韩军事部署的扩容升级。同时，韩日关系急剧升温，韩国在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发展中的角色越来越冒进。这些举动将带来阵营对抗和地区分裂，破坏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环境，值得高度警惕。

上图：韩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登陆演练。



5月14日，日本民众在广岛街头举着“不要战争、不要核武器、不要G7”等标语，强烈抗议将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